

“选报”时期 《东方杂志》研究

(1904—1908)

丁文 著



“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

(1904—1908)

丁文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丁文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ISBN 978-7-100-07487-2

I. ①选… II. ①丁… III. ①期刊—研究—中国—
1904~1908 IV. ①G23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2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书出版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资助。

“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

(1904—1908)

丁文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87-2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7/8 插页 8

定价:29.00 元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时代漩涡内外传统士人与近代出版的相遇	32
第一节 甲辰年间的“甲午记忆”	32
一、出版情境的挪借	32
二、历史叙述与个人际遇	39
三、《东方杂志》的甲午回溯	48
第二节 “戊戌党锢”与海上出版	54
一、同乡·同年：商务编译所之成员聚合	54
二、“本社同人”考辨	63
三、近代都市中的“文化隐者”	72
第三节 “官”“民”调和的办刊理念	80
一、“文明国”与“新闻纸”	80
二、《时务报》：《东方杂志》的潜在对话者	90
三、营造一时之“国论”	101
第二章 “搜罗宏富”背后的“选择精审”	113
第一节 “类己性”中的众报拼图	113

第二节	传世意图下的文章经营	126
一、	循书籍之体例	126
二、	“一字一句间”的“经营之苦迹”	131
第三节	“节录”的文本遮蔽	144
一、	被删削的“潜文本”	144
二、	避绕时忌之外的深层考虑	153
第四节	体例设置中的自我定位	158
一、	从日报论说到“名论要件”	158
二、	“时评”与“杂俎”	168
三、	“足为课吏造士之助”	172
第三章	“选报”空间的建构	181
第一节	两种文本的冲突与弥合	184
一、	异质元素的滤除	184
二、	删改中的自我彰显	193
三、	文本与意旨的采撷	200
第二节	“本社撰稿”主题变奏中的“选论”	206
一、	精心构建的“众报一辞”	206
二、	他山之石与镜中之像	211
三、	“本社撰稿”的自我诠释	217
四、	“选论”的“触角”效应	225
第三节	作为“选论”文本重写形态的“本社撰稿”	236
一、	“本社撰稿”的双重特性	236
二、	“评论之评论”	242
三、	文本重写的生成过程	250

第四章 事件聚焦中的舆论理念	264
第一节 “无锡毁学”	265
一、“顽抗藐法”与“操切从事”.....	265
二、“学务消长之机关”.....	272
三、“苏抚批词”和报章论调.....	280
四、抗捐与毁学.....	287
第二节 “铁良南下”	295
一、“非常之预备”与“秘密之运动”.....	295
二、“中央集权”和“南北矛盾”.....	300
三、“庚子乱象”.....	307
四、报界众声的“真实”传递.....	313
第三节 从传统“清议”到近代“舆论”	324
一、清议·公论·舆论.....	324
二、“清议又何能尽信乎”.....	331
三、反思与抉择.....	337
结语	350
参考文献	375
附录一	
《东方杂志》“本社同人”简介.....	385
附录二	
1904年3月—1908年7月《东方杂志》所选报刊名称.....	390
附录三	
1904年3月—1908年7月《东方杂志》所选报刊创刊时间表... ..	393
后记	396

导 言

一

随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間拓展,“报刊研究”既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也成为一种视角与方法。在笔者看来,可以将“报刊研究”解析为三个层面。一是所有研究者都可能面对的“报刊研究”。随着现代文学学科对于古代文学学科规范的借鉴,建立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呼声日高,作为现代文学重要载体与传播接受方式的报刊成为研究者眼中越来越重要的原始文献。二是作为话题载体的报刊研究。由于报刊的丰富性与原生性,其成为具体话题探讨中的落脚点,这不仅使得相关探讨得以在一种更为“真实”而细腻生动的文学场景中展开,一些重要命题的探讨视角与格局也由此发生改变。三是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报刊研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选择具体报刊作为研究对象,普遍思路是为相关报刊设制特定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框架,并由此将其还原到与之相关的文学情境、思潮流派、文学史格局的划分中去,挖掘原始材料中所蕴涵的丰富信息,并试图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舆论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对于“报刊研究”的文学阐释。

相较于近年来“文学与教育”、“文学与城市”等研究范畴的提出,“报刊研究”所隶属的“文学生产与出版传播”这一研究空间似乎潜藏着某种复杂性。基于上文所说的前两个层面,“报刊研究”与其说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新寻觅到的一方研究天地,不如说是对于报刊作为基本材料与研究实践的普遍认同。但与此同时,新的困境由此产生:一方面,报刊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使研究者相信相关话题只要能还原到具体报刊中,就可以获取不一样的收获;另一方面,由于推进话题深入的任务过分依赖于原始资料的开采,往往又导致研究者对于原始资料的载体——即报刊本身的面貌多有忽略。

由此来反思《东方杂志》的研究状况,便会发现其间存在的一些意味深长的现象,或许正折射出报刊研究的某种普遍缺憾。例如,长久以来,研究者一直对《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一话题持有较为浓厚的兴趣。由于“五四”以前《东方杂志》曾回应过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刊物《新青年》、《新潮》抛出的话题,主编杜亚泉也与陈独秀、罗家伦有过论争,因此这一时段的《东方杂志》格外引人注目。然而如果将这一研究思路还原到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中,便会发现这一话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悄然呼应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思潮。当时曾编有《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①,其中第一部分“关于东西文化异同优劣的争论”中所选多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上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章。处于20世纪80年代学术脉络中的研究者们,出于一种对话“五四”的溯源心理,隐约间不乏存在将“五四”前后有

^①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关文化问题的争论视作当时文化讨论思想源头的意图。在此视角的观照下,不仅《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的几个争论回合的文章成为研究者们反复咀嚼的重要文本,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也以其独特的文明观吸引了研究者的目光^①。

不仅如此,对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探讨至今仍绵延不断^②的另一原因,还在于这一讨论本身丰富了有关“五四”的深入研究。作为1917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对手方的《东方杂志》,无疑容纳着有关这一运动的异质话语,因此,对其进行回眸反思,其价值仍指向“五四”命题本身。研究者们亟亟关注的是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所蕴藏的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元素,而并非《东方杂志》自身。

这其实正映照出《东方杂志》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这份杂志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者的视野,却又从未真正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看似悖论的现象始终贯穿在《东方杂志》的研究之中。联系上文所说的“报刊研究”往往对刊物本身面貌有所忽略,便会发现这一现象正典型地存在于《东方杂志》的研究状况之中。对于研究者来说,除了一味从报海中寻觅讯息、钩沉话题之外,充分正

^① 引发了杜亚泉研究热的是王元化的论文《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收入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关于杜亚泉,有研究资料汇编(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三联书店1999年版);重要研究成果有高力克《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朱华东《杜亚泉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2004年博士论文)等,可以窥见学界对这位《东方杂志》主编的持续关注。

^② 如陆小宁:《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李明山:《五四时期关于杂志编辑的一场论争——东方杂志对新潮杂志罗家伦批评的回应》,《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马海杰:《浅谈五四前期陈独秀杜亚泉东西文化之争辩》,《中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视、并小心对待作为研究对象的报刊本身,也许同样不可或缺。这一问题对于很大一部分报刊来说或许并不严重,因为经得起正面探讨的报刊毕竟只是少数;但就《东方杂志》这份横亘45年、几乎成为一部近现代史“见证者”的重要刊物而言,一味漠视、回避其真实面貌,才是值得警惕的。

可以发现,一方面很多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意识到了《东方杂志》的重要性与其资料、话题方面的价值,在研究中时常对《东方杂志》上的文章加以引用,或者以之作为研究中的落脚点与标本。例如,有的研究者从第三十卷第一号“新年的梦想”专题切入考察“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①;有的则根据日俄战争时期的《东方杂志》解读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潮脉络^②;而《清末改革与报刊舆论——以〈东方杂志〉为中心》^③、《〈东方杂志〉与清末立宪宣传》^④则分别通过《东方杂志》考察清末的改革以及立宪运动。从根本上说,这类研究都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份刊物本身蕴藏的丰富话题,也足以支撑研究者从多个角度加以切入探讨。

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这份刊物的面貌却始终呈现出模糊状态。不仅新闻史家在叙述杂志基本情况时,

① 郑大华:《“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李安山:《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从〈东方杂志〉看日俄战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③ 杨兆敏:《清末改革与报刊舆论——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1995级硕士论文。

④ 唐富满:《〈东方杂志〉与清末立宪宣传》,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思想史方向2003级硕士论文。

往往不能做到准确无误^①；甚至就连专门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亦不能令人满意。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黄良吉的《〈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②，是最早研究《东方杂志》的学位论文。但此文仅以 10 万字不到的篇幅试图考察整个 45 年的《东方杂志》，不仅整体的研究格局有些按历史时段对刊物进行分段概述的意味，史实叙述也多有不够谨严之处。因此，认定《东方杂志》在“报刊研究”家族中仍然是一位“熟悉的陌生者”，并不过分。

就这一意义而言，《东方杂志》在研究中多被视作资料库或话题载体，仅仅可以归入宽泛意义上的“报刊研究”，而属于上述第三个层面，即真正将其作为正面研讨对象的研究并未展开。需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这一刊物“身份未明”的状态，作为资料库而存在的《东方杂志》的功能是有欠缺的，甚至还会成为研究中潜存的陷阱。例如，经过笔者的比照阅读，发现《东方杂志》上所选的众报论说绝大部分都经过不同程度的删改。此前许多研究者出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未将《东方杂志》的转载文本一一核实原文，便将其与原刊文本一视同仁、不加分辨地径直引用，其中潜藏的危机自然不言而喻。

事实上，《东方杂志》在晚清报刊舆论场域的纵与横两个维度

^① 例如方汉奇在《〈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曾叙述道：“早期的《东方杂志》……除了本社自撰的一篇‘社说’和‘广辑新闻’之外……”实际上，每期“本社撰稿”的篇数应为两篇，初创期还出现过三篇或四篇的情况，并非仅有一篇。此文还提到“《东方杂志》初创时，自揭其宗旨是‘介绍新知’和‘启导国民’”。实际上，《东方杂志》创刊号上《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中首条便将“启导国民”与“联络东亚”列为杂志宗旨。方文见《东方》2000 年第 11 期。

^② 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年版。

上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纵向坐标看,《东方杂志》与维新派刊物以及沪上激进话语的复杂关联,使其本身成为从维新刊物向激进刊物历史转型中的一种珍贵的未完成形态,并因此具有特殊的考察意义;从横向坐标看,由于《东方杂志》对同时期报界言论的选择性接受,它呈现了一个纯化了的舆论空间所蕴含着的种种可能性,使其成为考察晚清报刊舆论空间的建构状态的最合适文本。如果用这一眼光来衡量此前《东方杂志》研究中的第三个层面,会发现此前的研究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缺憾。

曾有论者反思“报刊研究”中的一种现象:即往往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等热门理论设置为框架背景,试图通过理论的介入突破“报刊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就事论事,零打碎敲”^①的狭小局面,将论题引向深入。平心而论,这类试图平衡“史料”与“问题”的努力本身值得肯定;但问题在于,“报刊研究”如果完全依赖某几种外来理论的引入来制造深度,却正透露出“报刊研究”的未成熟性。

这里,暂且先不讨论“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等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学语境中的“报刊研究”,单就普遍存在的这一预设理论框架现象而言,在作为独立考察对象的《东方杂志》研究中,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中比较厚实的是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②,此书从现代舆论催生的角度解读《东方杂志》,其论述多有启迪之处。

① 郝庆军:《报刊研究莫入误区 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②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但作者似乎过于执著其自身的思想史兴趣,将《东方杂志》的话题分别冠以理性主义、渐进主义、民族主义、调和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等几类思潮,并以此来设置论述框架,因此将《东方杂志》中的论说文本变成了对几种主义的诠释与注脚,从而忽略了对刊物本身的必要体察。

因此,如何既避免外来理论的过度介入而造成的把报刊降低为理论的求证场与附庸品,以保持对于《东方杂志》这一研究对象的充分体贴,同时又力避过分关注报刊本身而容易造成的细节化与琐屑感的倾向,便需要小心把握其间的分寸。这其实要求重新思考有关“报刊研究”的“问题性”。这种调整视角以关注报刊本身的研究思路并不意味着问题性的缺失。事实上,由于更为贴近报刊的面貌,也就更需要依据刊物本身的特色来度身订制探讨问题的具体视角,由此探讨的问题较之外在理论预设而产生的问题来说,或许才能够具备真正的研究价值。

具体到本书的研究对象——“选报”时期的《东方杂志》,其区别于晚清绝大多数报刊的一个特殊之处,正在于“选报”体例。这一时段的《东方杂志》选择了48种报刊上的论说,囊括了当时所有有影响的报刊^①。因此,倘若学界对于这批晚清报刊的研究已经到达一定高度的话,无疑会给本书考察这份建立在众报言论基础之上的“选报”带来极大的便利。然而遗憾的是,这批晚清报纸的研究并不充分。仅以当时最有影响的几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大公报》等为例:出有影印本的《申报》、

① 参见“附录二:1904年3月—1908年7月《东方杂志》所选报刊名称”。

《大公报》中,只有《申报》得到了较多关注^①,而作为晚清北方舆论重镇的《大公报》研究则仍不充分^②。其他如《新闻报》、《中外日报》、《时报》,或许因为查找不易,尚未真正进入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几种晚清大报的研究状况尚且如此,其他的诸多报刊,例如《外交报》、《南方报》、《中华报》等,往往绝少有人涉足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学界对于晚清报刊关注的时段上看,目前研究多集中在1904年以前的报刊,1904至1908这一时段内的报刊研究则不多见。其实就在这一时期,《警钟日报》、《时报》、《南方报》、《神州日报》等报纸先后创刊,但专门研究很少。究其原因,或许仍是政治派别意识在晚清报刊研究中的潜在延续。可以注意到,对于维新派重要刊物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从报》等研究较多,而1904年以后的《民报》,由于是革命派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因此也不乏关注^③。相对于这些处在各自时代“最前沿”地位的报刊,《时报》等刊物无论将其归为立宪派、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显得色调不纯。然而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最新思潮的报刊毕竟只是极少数,上面提到的这些报纸虽然不如《时务报》、《民报》等那样引领

① 近年来,国内有关《申报》研究的博士论文有:范继忠:《晚清〈申报〉与上海城市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1年博士论文;方迎九:《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消长——早期〈申报〉文人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2002年博士论文;李彦东:《早期申报馆:新闻传播与小说生产之关系》,北京大学中文系2004年博士论文;黄晋祥:《〈申报〉社评与晚清的民族运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5年博士论文。这些博士论文代表了国内《申报》研究的主要成果。

② 对于晚清时期《大公报》研究分量较重的成果有:侯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如陈孟坚:《民报与辛亥革命》,中正书局1986年版;朱滋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版,等。

风潮,但代表了社会中更大多数人的意识倾向,因此更具有考察历史全貌的意义。倘若抛开对于先锋思想的追寻,对这一时段内的其他报刊似乎也应当保持必要的关注。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本书选取 1904—1908 年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从根本上看固然是出于这一时段内《东方杂志》的内在特征,但由于上面提及的《警钟日报》、《时报》、《中外日报》、《南方报》、《神州日报》等诸种报纸都曾入选《东方杂志》,因此笔者也希望能够通过对《东方杂志》的梳理,以《东方杂志》为原点,呈现出这几年间晚清社会的舆论图景。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的研究还会由此延伸。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学者 Joan Judge 的《时报》研究——《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①,此书将“政治性出版社”的出现(The Rise of the Political Press)视作一种印刷的力量(Power of Print)。对于本书来说,这一“政治性出版社”的提法颇具启发意义。其实,《东方杂志》所背靠的商务印书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其作为近代知识文化传播机构、尤其是教科书出版重镇的形象均相当突出。因此,“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政论性,无疑正是这一形象中的异质元素。但恰恰由于《东方杂志》的存在,形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政治性出版社”这一特征。对于本书的探讨而言,更为复杂的是,《东方杂志》的政论性又是通过“选报”这一特殊体例表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区别于诸如像《时报》这类以一家之言来表达自我政治理想的报刊媒体,《东方杂志》是通过汇集众家言论来体现其自身的政治理念。也正是这层正反相参、明

^① [美]Joan Judge:《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文化变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明暗暗的政治色彩,使得商务印书馆与晚清沪上时《报馆》这类纯粹的“政治性出版社”有所区别:一方面,身处晚清沪上的商务印书馆具备了这类“政治性出版社”的潜质与可能,另一方面,出于经营考虑,商务印书馆又通过对其教科书出版重镇的形象的自我建构,遮蔽并弱化了“政治性出版社”的成分。

对于本书来说,如何用文学眼光来解读这一份政论性刊物,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以文学的专业背景展开对这份政论性占主导的“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讨论,多少显得有些逾越本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近代的文学刊物往往以下层启蒙为主旨,其目的多在于“为人”而非“为己”,从而决定了其发言姿态与自我声音均会着意调整。但政论性报刊却或是致力于“上层启蒙”,或是试图扮演沟通上下层的发言人,自我声音往往占据主导。对于传统中国士人来说,政治情结与经世理想总是其最大牵挂,而投身于近代出版的传统士人将在近世变局中如何施展其政治抱负,一份寄托了他们政治理想的政论刊物或许正是一个良好的讨论载体。由这一角度来观照一份政论性期刊,或许会得到与考察文学性期刊不同的收获。

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选报”特征,对于“选报”中复杂的言论层次的辨析也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笔者对于《东方杂志》的“选报”体例所蕴含的话语层次将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至于选报所涉及的言论意义与话题价值却并非本书的考察重点。由此,本书对于这份政论性刊物的言论探讨或许将不会陷入某种“非己所长”的越界的苦恼。

从一切舆论形态都是被选择呈现这一意义上看,“选报”不仅仅是1904年至1908年《东方杂志》的刊物体例,抑或是一种报刊

类型、出版现象,更是一种普遍的舆论形态。尽力淡化其“政治性出版社”潜质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报刊繁荣基础上,通过《东方杂志》体现出一种掌控舆论的努力。从这一意义上看,对于“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探讨,其实正蕴含着探讨近代中国舆论控制最初状态的价值。而在《东方杂志》的“选报”内外,其实存在着两个舆论空间:即《东方杂志》通过精心选择而建构起来的“选报”空间,以及无限巨大的舆论空间实景。前者实际上为后人感知后者的巨大与丰富提供了一个契机。

基于这些原因,笔者将本书的切入点放在《东方杂志》的“选报”体例上。这不仅是因为凭借“选报”这一特殊的言论组织方式和话语策略,我们可以细腻地感触到《东方杂志》的真实状况,把握其内部空间建构的完整过程;更是因为通过“选报”这一窗口,能够感知其外部舆论空间的丰富情态,并进一步探究两个空间的相似与差异,彼此间能量的交流与转换,舆论的发生与控制等诸多复杂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成果,或许将会使得本书的研究对象从外部理论的预设框架或是内在思想的一般载体的尴尬境地中摆脱出去。

二

《东方杂志》是20世纪上半叶发行时期最长的一份杂志。它始创于1904年3月11日,终刊于1948年12月,历时45年,共出44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在其存世期间,便被报学史家誉为“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①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